

凭窗读史

居延汉简如何历经波折送抵港大

居延汉简被誉为“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”或“中国古文献”四大发现之一。1930年,在中国西北的居延考古中,西北科考团瑞典团员贝格满首先发现汉简。至1931年,共出土万余枚,5月运入北平。这批简牍被称为“居延汉简”。

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院长“大事记”之1937年记载:“卢沟桥事变后,文科研究所沈仲章冒着生命危险,几经周折,将西北科学考察团存该所的居延汉简转移至香港大学。”存世两千年的居延汉简在烽火中得救,这是抗战中斗智斗勇的文化胜仗,也是惊险跌宕、有伤有痛的艰难仗。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,原本鲜有人知,后又遭遗忘湮没。我们依据可见历史资料、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当事人回忆,拼缀成文,以纪念这段抗战烽火中“历经波折”保存文脉的往事。

1937年7月29日,北平沦陷。日军控制北京大学。当时,居延汉简仍在该校文科研究所。沈仲章是该所“语音音乐实验室”助教,兼任西北科考团理事兼干事。他抓住敌方脚跟不稳的短暂窗口,带领两名助手,把万余枚简牍偷运出北大。为保护这批脆弱的文物,沈仲章精心设计了两个特制的箱子,外壳用木板,内衬一层瓦楞状铁皮,防震防潮。他计算万余枚简牍及填充物所需的大致容积,设定箱体尺寸。他与助手周殿福清点简牍,包裹安放,封箱前反复实验焊接方法,确保不渗水。封盖后,约半年未曾打开,直至运入港大,由沈仲章亲自启封。途中,无论在寄存还是托运的单据上,所报都是个人衣物,不见“汉简”等字样。因此,除沈仲章自己,全程无人知晓简牍行踪。

1937年8月,万余枚汉简装箱封箱后,沈仲章担心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,想起自己因曾协助德国教授翻译佛经,在德华银行有个户头,估计日方对德国的银行会客气些,便把两箱简牍寄存在那里。8月12日,沈仲章带着寄存凭证,只身逃离北平,南下寻找北大领导。火车时走时停,第二天凌晨才抵天津,碰上“八一三事变”爆发,又滞留天津。他往长沙发电,托徐森玉转北大领导,收到的回电是让他就地等候。

12月上旬,徐森玉来天津传达:由沈仲章单人负责南运简牍,终点是香港大学。徐森玉走后,约12月中旬,沈仲章潜回北平,把两箱简牍原封运到天津,寄存在托运商库房。因后方一度重新考虑运送简牍的终点,沈仲章不得不等待数日。当时日本人接管塘沽码头,关卡道道,眼线处处,他需反复排算敌情规律,设想对策。简牍箱子内衬铁皮,焊锡封死,一旦被拆封后暴露,则前功尽弃,即便不被扣押,若被缺乏经验的人摆弄,也会大受损伤。他为确保箱子在途中不被打开检查,可谓绞尽脑汁,力求环环落实,原计划在1938年春节后启运。

岂料,1937年12月下旬,日方情报部门发出通缉令,追捕沈仲章。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,他好不容易躲过一劫,但深知必须立刻离开天津。因此,只能提前启运居延汉简。在天津上船时,沈仲章与中国检验员、搬运工合作,护卫两箱简牍闯过海关,亲眼看着搬上船。两箱简牍作为行李托运,他自己登上同一条船——终点是香港。

居延汉简转移的最后阶段,从靠岸香港码头到入存香港大学的三个重要日期已基本厘清,接下来围绕这三个日期,对汉简跌宕惊险的赴港过程



▲居延汉简之《水元器物簿》现藏台北“中研院”

和相关人事稍作梳理。

运简之船靠岸香港的日期

载运居延汉简之船靠岸香港码头,应不晚于1938年1月10日。这是从香港学者、爱国教育家陈君葆1938年1月12日的日记分析所得。日记记录:

汉代木简乙事。弄得非常的不好,徐森玉接到沈仲章的电报,说自己在青岛脱了船,因此托了船上的吴景祯把东西带来。吴景祯是谁大家都不知到(道)。海口船从天津到了两日了,昨天徐到船上去找吴,已登岸去了,又不得要领,因此今天来找地山想办法。

其中“海口船从天津到了两日了”,如果“两”为确数,则该船1938年1月10日抵港。如果“两”表示概数,则该船已到了数日,也就是早于1月10日就到了。围绕这则日记中的具体内容,还可补充一些其他信息。

沈仲章怎么会“在青岛脱了船”?

沈仲章所搭之船,中途停靠青岛,装运一批货物。船开进胶州湾,天还没亮。沈仲章问了船长与买办,要停几个小时,天黑后才起锚。青岛尚未沦陷,沈仲章上岸办两件事要事。第一件事,去发电报。他要通知后方,居延汉简已提前启运,预计何日抵达香港,请接应人员做好准备。他带着两箱汉简仓皇离开天津时,来不及与后方通气,船停青岛,给了他机会。第二事,到火车站追查转运物品。据前文所述,沈仲章自8月13日到12月末,滞留天津近五个月,义务自设中转站,协助北大与其他院校师生转移。11月,北大教务长郑天挺托他代运校方档案,教授罗常培托他代运诸多教授的书籍。他离开天津前,获悉部分资料已运到,部分搁在半途。青岛是海运转运交接点,他要去火车站查查。

办完这两件事,沈仲章回到码头,才下午两三点钟。岂料船已提前开了。

吴景祯是谁?

吴景祯是北大地质系新生。1937年入校。当时船票难求,沈仲章帮他买到了船票。吴景祯随身携带了一些北大教学仪器与课本,上船后听说日本海军检查极其野蛮,来找沈仲章想办法。他把吴景祯所携物品放入自己的手提皮箱。箱子里面装着与居延汉简相关的重要物件,还有领取托运行李即那两箱简牍的托运单。

沈仲章靠着能说方言,一上船就与广东买办交上了朋友,帮他们做事,住进了买办舱。他向买办请教:有没有日本海军不查的地方?买办说:船长室。沈仲章又靠着能说外语,去向英国船长求助。船长于是把皮箱藏在卧床上。徐森玉接到的是沈仲章的哪个电

报?沈仲章在青岛,一共发出三个电报。

上岸之初,发出第一个电报,发给后方。告知自己与居延汉简(猜想会采用“东西”之类的说法指称)已逃离敌占区,搭哪条船,哪天可抵达香港等。电文长达几百字,兜里的钱用去一半。

脱船之后,发出第二个电报,是用英文发给英国船长的海底电报,要求他把代管的手提皮箱交给三等舱的吴景祯,请吴把皮箱交给香港大学的许地山妥为保管。因海底电报特别贵,把另一半钱也差不多用完了。

又发出第三个电报,即上述陈君葆日记提及的徐森玉接到的电报。因为快没钱了,电文极短。从陈君葆日记和别处寻痕,徐森玉应该还知晓第一个电报的内容。

沈仲章为什么不在电报里提及托运行单相关信息?一因钱不够,二不宜转传,三怕日方嗅到蛛丝马迹。为保万无一失,他在电报里只要求妥为保管皮箱。

托运单返回香港的日期

沈仲章是何时、如何抵达香港并拿回托运单的呢?

在青岛脱船的第二天,他去轮船公司驻青岛办公室交涉,方知他在岸上时海面出现了日本军舰,像要登陆,轮船公司于命令船长紧急启航。因沈仲章善英文,说动了办公室英国负责人,答应等公司再派船来装货时,可让他免费搭船。五天后,等来一条货船。沈仲章搭船驶出胶州湾时,隐隐似闻岸上枪声。等船停靠上海时,沈仲章上岸,见有外文报纸报道,日军刚刚占领了青岛。

沈仲章护简五个多月来,都是垫付自己的钱,彼时已身无分文。在上海时,按徐森玉所言,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上海办事处补领路费,但没能领到。他没办法,只好去找姐姐沈宝珠,说服她把当时可救父亲一命的钱全部拿出来,才得以继续前往香港。

沈仲章到了香港,马上找许地山,

▲沈仲章精心设计的两个特制箱的缩小模型(中央电视台《他们与天地永存》纪录片摄制团队提供)

但是皮箱无影无踪,他急坏了。不久接到吴景祯来信,大意为:抵达香港上岸后找不到许地山,就把箱子带到了长沙,交给了北大校长蒋梦麟,蒋校长不久将坐飞机去香港,届时会把箱子带给你。沈仲章只能在香港等蒋梦麟。不幸的是,因为没能赶上,父亲沈慰慈因之而未能及时得救,连尸骨都不知所终。这令沈仲章一生伤痛难言。

蒋梦麟携皮箱飞港的日期确切无疑。据郑天挺1938年2月2日的日记:“上午孟孟乘飞机赴港。”另据沈仲章口述笔录:“这个木简的条数,跟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邮票一大包等东西,连同北大的许多东西,一起直到蒋梦麟校长到港,才带来香港。”所以,1938年2月2日蒋梦麟飞港之日,就是“木简的条数”也即领取居延汉简的托运凭证返港之日。那么蒋梦麟是否知道皮箱与居延汉简有关?他应该是知道沈仲章在秘密保护居延汉简的。1937年沈仲章从天津发信长沙汇报自救之举,托徐森玉转北大领导,当时蒋梦麟已在长沙;12月上旬徐森玉到津向沈仲章传达“几个大帽子决定”,北大校长应是决策者之一。

回顾托运单返回香港的过程,不难发现沈仲章那个手提皮箱可谓历经四次交接,进行了“水陆空万里周游记”。第一次,即前文所述,在天津上船时,为躲避日军检查,沈仲章把皮箱交给英国船长。第二次,是船抵香港前,英国船长按照海底电报,把皮箱交给吴景祯,嘱他转交许地山保管。至此为水路。第三次,是吴景祯在香港没人接应,就带着皮箱,经由陆路,前往重庆,再到长沙,交给蒋梦麟。第四次,是蒋乘飞机到香港后,把皮箱还给沈仲章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皮箱经过四双手,但托运单只经过一双

手。沈仲章在天津亲手藏进箱内,后在香港亲手拿出来。至于英国船长,他始终不知道,自己无意中的善举为保护居延汉简立了大功。

居延汉简入存港大的日期

据沈仲章口述:“我去找蒋,他把箱子慎重地交给我。打开一看,原封未动。北大的东西交给他。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的东西和木简收条都在里头。”

拿到皮箱和“木简收条”后,沈仲章与许地山按约定时间,一起去码头。逾期未领的托运行李早已进了仓库,按公司、船名、航班等分块堆放。仓库保管员按托运单查找箱子,未果。沈仲章自己找了很久,也未果。他担心极了,当晚辗转反侧,夜不成寐:“会不会港内地通讯走漏风声,被敌方抢先一步冒领了?”次日一早,与许地山再去码头,在仓库里又费一番周折,终于在一个角落的一块大油布下找到了两个箱子。

随后,许地山与沈仲章把两箱简牍从码头运进香港大学,再由沈仲章亲手启封,在许地山与陈君葆等人见证下,“验明”居延汉简“正身”。最后,放进铁制的保险柜中,关上柜门,将几道锁一一锁上,至此才算正式入存。合同上写明,沈仲章持一套钥匙,港大持另一套钥匙,双方在才可开启保险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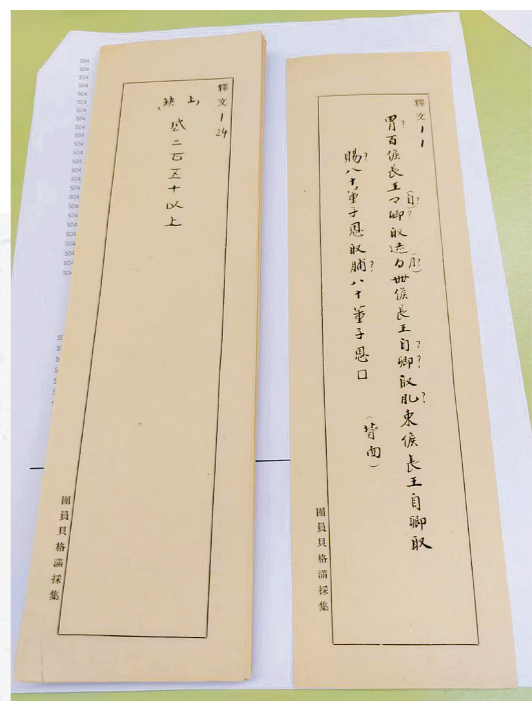
居延汉简入存港大的日期,是根据一通1938年邓衍林致袁同礼函推算的。

邓函报告北平图书馆香港办事处的工作情况,兼有“蒋校长已于日前飞港。木简已安全运到,现储中文学院”,落款“一月五日”,一直被误以为1938年1月5日。蒋校长飞港在前,邓衍林写此函在后。既然由郑天挺日记已知蒋是1938年2月2日飞港,则可推知邓函定写于2月2日之后。所以落款的“一月五日”肯定不是指公历1月5日。1938年农历一月五日对应的公历是2月4日。蒋校长2月2日飞港,邓衍林2月4日函中述其“日前飞港”,这样就通了。综上,邓函写于1938年2月4日,而木简最晚在2月4日已经“储(港大)中文学院”。

一些余绪

1938年1月12日陈君葆日记很长,再摘一段:

……到太古洋行,莫恩如告诉我们说东西要到三点半才能搬到岸上来,并且船上的买办有一个条子给他沈仲章们还欠下伙食四十五元未交,提行李时须先缴清此款云。于是我对徐讲事情如此也只好等了,他不妨放心,其余的事,可



▲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保存的居延汉简释文

由我们关照。他下午趁三点半的芝沙家喇荷兰船到上海去,船票已打好了,因此我就在电报局门口和他作别。

至今仍有误认为,买办要求“缴清”伙食欠款才可“提”的“行李”就是居延汉简。两箱简牍是行李船托运行李,船上买办并不知道。装有托运单的手提皮箱在英国船长那里,后又交给了吴景祯,也未经买办。买办条子里所谓的“行李”,指的应该是沈仲章在青岛拖船时,留在买办舱里的随身杂物。

此外,陈君葆日记早在1938年1月6日即记录有“汉代木简共五箱”。经与许地山之子周琴仲、徐森玉之子徐文堪等拼合信息,并从历史文献中觅痕,当事人后代已达共识:既然徐森玉在津亲口与沈仲章约定,除了你自己,不让任何人知道真情,而他在居延汉简尚未脱险时,却对多人称“汉代木简”已到港,更像是用来迷惑的“烟雾”。

陈君葆自从与沈仲章相见之日起,便视护简为“分内事”,不再写进日记。随后近四年,沈仲章在港大图书馆整理简牍,编制图册,都有赖陈君葆提供各种协助。

时光飞逝,1973年,吴景祯作为美国民间代表访华,会见了沈仲章。1977年,劳榘主编的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在台湾出版。书内每张图版,都是简牍运到香港后,由沈仲章拍摄的。全书六百多页的页序及每图布局,也都由他编排。吴景祯托美国汉学家友人去台湾购得此书后带回美国,又寄往上海,扉页题词写道:

沈仲章老师:

当初不觉得但其后才知道这是我给你由青岛带到香港的破竹片。而各种恶劣的景况也如现在摇身一变竟成了这两本书。劳榘是我中学国文老师他作完这两本书即行故去。而想不到又是我能在台北朋友买了此书而由美国寄给你。这是你宝贵的历史文物成果,现在献给你由你赏玩。

生 吴景祯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三日于美麻省乌兹堡

其实,2003年劳榘去世,沈仲章生前曾接其数函。1984年4月11日劳榘致沈仲章函写道:

至于我所经手印出的,还是您从香港寄来的反面照片再转成正面。

同函还写道:

这一批国宝在敌人及炮火威胁下,能够抢救出来,已经十分不容易……如其不然,汉简也会像北京人的遗骨一样,不知道遗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所言极是。倘若沈仲章不能活着逃出青岛,或不能及时赶到香港,那么居延汉简极可能像北京人头盖骨那样失踪。

居延汉简的命运与中国平民的命运交织,中华文脉与华夏儿女血脉相连。值此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,谨呈本篇,以缅怀这段在烽火中奋力守护中华文脉的历史。

谢荣霖 沈亚明



文明贵阳
WEN MING GUI YANG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讲文明 树新风

文明驾乘电动车

登记上牌戴头盔 文明骑行不懈怠



贵阳市精神文明办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宣